

美国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反全球化浪潮，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对外奉行单边主义，对内压制少数族裔，给全球的进步社会运动造成沉重打击。美国国内政治不稳定要素持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后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社会组织以及劳工运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①

一、马克思著作研究

《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其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巅峰之作，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7年是《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数位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纪念文章，加拿大约克大学举办了“150年后的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替代”国际学术会议（详见第四部分）。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布鲁斯·柯蒂斯（Bruce Curtis）在《大陆思想和理论》杂志2017年第1期发表《〈资本论〉150周年：马克思、曼德尔和方法论的思考》^②。该文是为了纪念《资本论》第1卷发表150周年，它讨论了马克

^①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KS031）成果。

^② Bruce Curtis: “A Sesquicentennial of *Capital*: Marx, Mandel and Methodological Musings”, in *Continental Thought & Theory*, 2017 (1).

恩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模型，他去世后由恩格斯编辑的著作进一步阐释了这个模型。模型：劳动价值理论，其中生产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总量是通过出售商品（包含剩余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根据租金和利息分配的。这个模型没有对资本主义作出明确的预断。在预断方面，作者转向了曼德尔。曼德尔的《后期资本主义》把帝国主义描述为寻求暴利。一部分是将生产率更高的公司渗透进新的部门（从而在部门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降低利润率），另一部分是围绕着矿产和土地的寻租。这表明，原始积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当然不是马克思在货币资本循环中提出的已完结的过程。M—C…P…C’—M’ 在何种程度上包含了所有形式的收益创造和分配，以及剩余价值的创造？重大金融危机在何种程度上使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成为必要，进而挑战《资本论》的模型和方法论，例如，（1）金融化；（2）原始积累；（3）阶级和意识。作者提出，为了增强《资本论》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需要从哲学转向社会科学。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劳伦斯·克劳斯（Laurence Krause）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 2017 年第 4 期发表《马克思论 19 世纪的金本位制》^①。该文指出，在《资本论》第 3 卷第 5 部分，马克思分析了 19 世纪中叶英国的货币和信贷系统之间的关系。克劳斯认为这种关系导致了 1847、1857、1867 年危机的复杂形式，以及应对这些危机的英国银行的矛盾角色和效力。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的大卫·克里丝詹森—古拉尔（David Kristjanson—Gural）在《重思马克思主义》2017 年第 4 期发表《马克思的需求、价值和价格：对比共时和历时的路径》^②，该文考察了两种研究路径，并提出综合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历时方法。在理解价值与价格关系方面，一种简单再生产的商品模型被用来对比共时和历时的单一系统，这个模型说明了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总需求的变化影响了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规定。共时路径正确地说明，现阶段生产和交换决定价值与交换价值；历时路径正确地提出，有必要说明来自于先前时期的价值量级，并把两个时期的价值转换理论化。采用马克思提出的历时方法，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可以根据需求水平变化持续

① Laurence Krause: “Marx on the Mid-nineteenth-Century Gold Standard”,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7 (4).

② David Kristjanson-Gural: “Demand, Values, and Prices in Marx: Contrasting Simultaneous and Temporal Approaches”,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7 (4).

地被模式化。

美国欧克顿社区学院的彼得·胡迪斯 (Peter Hudis) 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 2017 年第 1 期发表《马克思的当代重思：回应保罗·凯洛格和伊恩·安格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的评论》^①。该文认为，保罗·凯洛格 (Paul Kellogg) 和伊恩·安格斯 (Ian Angus) 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的精彩评论推进了关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胡迪斯认为，凯洛格抓住了其思想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如果缺失了人类主体是不可想象的，解决资本主义的客观矛盾的钥匙存在于劳动者的主观活动中。这意味着，如果不解决特定的主体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成立的。那些所谓的“客观主义者”把主体性掩盖在结构的虚拟自我运动之下，带上了斯大林主义的阴霾。但是那些强调自发性和自我活动的人，如果不考虑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那么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严肃对待主体问题的呢？反叛主体的活动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关键，那么“革命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是否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新的官僚体系或统治阶级？如果现世中没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方案，那么自由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乌托邦，胡迪斯从两个方面进行反驳。虽然马克思没有讨论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但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讨论，因为斯大林主义失败了，如何有效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行动成为时代主题。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方面，胡迪斯更强调价值形式而不是价值的量。马克思把那些强调价值的定量测定的人称为“社会主义的”新李嘉图主义者。胡迪斯认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把握住马克思价值批判的激进意义，因为他们更强调价值的量。

美国独立学者雷迪斯·胡果 (Hugo Radice) 在《资本与阶级》杂志 2017 年第 3 期发表了《彼得·胡斯迪：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②。他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的关系始终是《共产党宣言》中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明确否定。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目的肯定不是摒弃对其他社会秩序的讨论，而是说这种讨论需要基于对资本主义彻底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因此，文森特·盖根 (Vincent Geoghegan) 在其《乌托邦主义与

① Peter Hudis: "Rethinking Marx for Today: A Response to Paul Kellogg's and Ian Angus's Reviews of 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in *Socialist Studies*, 2017 (1).

② Hugo Radice: "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in *Capital & Class*, 2017 (3).

马克思主义》(1987)中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尊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而且赞同他们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他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简明的、可读的历史记录,描述了从第二国际开始乌托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持续接触,包括莫里斯、布洛赫、马尔库塞、巴罗和戈尔兹的文稿。该文所讨论的书籍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独特视角。彼得·胡斯迪认为,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人们可以勾勒出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它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相一致。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概念是一种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时间进程。在这个进程之初,读者首先看到一份关于最近哲学文献的大篇幅介绍,细致区分了(集中于资本逻辑的)“客观主义”分析与(集中于资本历史的)“主观主义”分析。胡斯迪自己显然倾向于一种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方法,尤其是对邓亚耶夫斯卡娅、托尼史密斯和奥尔曼。然而,对于任何不熟悉这些争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章节,读者可能更喜欢跳过第9—36页,再回头读它们。接下来的四章讨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资本论》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1卷到第3卷,以及马克思的晚期著作,特别是有关巴黎公社和《哥达纲领》的章节。胡斯迪显然反对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每一章都描述了替代方案中的新元素,它们来自于马克思对资本论的理论解读,以及对19世纪中期历史剧变的实证检验。这些章节的论点是精心构建和阐述的典范,并详细引用了马克思自己的文本;最后用一个简短的结论进行了总结,有力地证明了当今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需要一种明确的超验方法,即一种将批判和替代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胡果随后介绍了一名社会学家露丝·莱维塔斯(Ruth Levitas),她已经成为乌托邦发展史的主要研究者,著有批判当做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的概念》(1990)、《包容性社会?社会排斥与新劳动》(1998)。她的著作《作为一种方法的乌托邦》的主旨是“想象的社会重构”,要求在现有社会秩序及其多重问题的范围内,彻底消除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的局限。

二、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

为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2017年5月24日至26日,由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理事会和约克大学主办、约克大学马克思学院承办的“150年后的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替代”国际学术

会议在约克大学举行。^①此次会议由加拿大约克大学马塞罗·默斯托(Marcello Musto)教授独立组织,汇集了包括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约翰·B.福斯特(John B. Foster)、凯文·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鲍勃·雅索普(Bob Jessop)、伯特·奥尔曼(Bertell Ollman)、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乔治·科米奈尔(George Comninel)等来自10个国家20余所大学的20多位国际著名学者。

此次会议共分为四大主题,即《资本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资本论》的多维向度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资本论》的革命意蕴与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资本论》的未完成性与当代书写。

(一)《资本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

来自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迈克尔·克莱特科(Michael Kraetke)教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巴巴克·阿米尼(Babak Mamini)博士、美国西北大学的托马什·达布罗斯基(Tomash Dabrowski)、芬兰坦佩雷大学的保拉·劳哈拉(Paula Rauhala)博士、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的斋藤幸平(Kohei Saito)副教授和韩国庆尚国立大学的丁声镇(Seongjin Jeong)教授分别就《资本论》在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波兰、北欧、日本和韩国的传播情况做了主题发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资本论》在英语世界之外的传播情况。达布罗斯基博士介绍了《资本论》在波兰的传播情况。他指出,在波兰,《资本论》在全部出版之前就已经广为人知,并且是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但1950年斯大林“肃清运动”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转移研究领域,大量原始资料遭到破坏,这也是至今很难看到关于《资本论》在波兰的传播与研究状况的文章的原因。

默斯托教授指出,上述发言人是他和阿米尼博士主编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传播和接受的全球史》一书的部分作者。该书旨在全面展现《资本论》在全世界70多种语言中的翻译和传播情况。为了保持《资本论》在不同语言、政治语境和著作文献中的真实境况,每一章都是由相应的母语学者基于第一手资料撰写而成。这一项目旨在展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接受、理解、遮蔽或扭曲情况。

^① 会议内容主要参考了张福公:《重新探索马克思〈资本论〉的当代意义——“150年后的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替代”国际学术会议综述》,载《哲学分析》2017年第6期。在此表示感谢。

（二）《资本论》的多维向度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如何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潜力已成为西方左翼学界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美国耶鲁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说，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曾无数次被宣告死亡的马克思主义再次全面复活。马克思继续向我们提供着极其丰富的分析方法和政治洞见。但面对现实世界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既要严谨、批判地阅读马克思，又要广泛汲取多元理论资源，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必将是不断分析和实践的产物。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们究竟需要哪一种马克思？沃勒斯坦的答案是：必须放眼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当代意义。加拿大吉尔大学的W. C. 罗伯茨（William C. Roberts）试图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导出一种批判政治理论。他指出，马克思从人类解放角度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批判是最具有政治意蕴的。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统治的秘密就在于“商品的价值形式”。因为价值的生产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价值的实现则通过市场来完成，因此，市场中的每个人都身处一种不确定的、强制的客观统治之中。虽然，美国芝加哥大学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正确指出这种“抽象统治结构”是资本主义下不自由的根基，但他既误认了“抽象统治”的来源，也没有说明抽象统治与阶级统治的关系。实际上，以商品交换—价值形式为基础的客观统治具有两种效应：一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屈从于这种客观统治，因此，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是客观统治机制的必然结果；二是这种客观统治强化了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阶级统治。因此，资本主义中的阶级统治是内在于客观抽象统治之中的，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

普殊同同样围绕劳动价值论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内在机制及其引发的当代危机，同时回应了罗伯茨的质疑。首先，他指认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重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方法论意义。他指出，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方法。因此，资本主义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生活形式和在全球性历史建构中形成的一种历史的、具体的抽象统治形式，且其自身不断发生着深刻变化。然后，他基于劳动、时间、价值概念剖析了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的实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中的劳动构成了一种新的相互依存形式，即个人的劳动发挥着获得他人劳动产品的似客体性手段的功能，这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社会中介形式。因此，资本主义中的

劳动具有两重性：一是物质形式的劳动，二是历史的、具体的社会中介活动。与劳动直接相关的便是价值。马克思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前者由生产数量决定，后者则是时间性的，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种时间具有两种维度：一是牛顿时间（同质的物理时间），二是历史时间（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单位时间变化意义上的内在时间），两者是辩证关联的。因此，资本主义的时间是由特殊的社会中介形式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起来的内在时间，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抽象统治结构。然而，价值在随时间动力向前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不合时宜，从而引发危机。最后，他分析了当前两种危机（环境恶化和劳动社会的终结）的原因及其可能出路。他指出，价值的时间维度构成了一种以生产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资本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加速了对原材料和能源的损耗，进而加速了对自然的破坏。也就是说，资本在追求无限积累的过程中忽视了自然的有限性。同样地，资本推动的社会知识的快速积累促使科技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促使创造价值的劳动本身趋于消失，最终导致无产阶级劳动变得不合时宜。而对于当代社会的未来出路，普殊同教授不赞同罗伯茨的观点，而认为马克思更倾向于一种基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张力的可能性，即资本本身会产生出未来社会的要素，但它又迫使人们面对越来越严酷的抉择：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俄勒冈大学约翰·B.福斯特教授深入剖析了马克思的代谢断裂理论、生态学价值形式分析、剥夺和不平等生态交换理论的当代意义。他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建构了一种生态政治经济学批判，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的顶点。首先，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新陈代谢”概念构成了马克思研究自然与社会之辩证关系的核心范畴。受R.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和J. V.李比希等人的影响，马克思明确区分了自然代谢和社会代谢，前者将自然过程看作一个整体，后者则代表着充满种种断裂的人类生产过程，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正是这种代谢断裂的根源。其次，马克思基于生态学价值形式分析指认了代谢断裂的实质，即资本主义的价值形成过程在本质上是对自然物质之使用价值的破坏，从而产生了更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代价。最后，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对生态资源的剥夺而建构了一种不平等生态交换理论。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对劳动和自然的剥夺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就是对农民和土地的系统剥夺，而全球性殖民扩张和奴隶制则是这一逻辑的延展。而且，这种剥夺不同于占用

和剥削，因为基于资本逻辑的剥夺是一种掠夺经济：一方面，资本将自然视作无偿的馈赠，从而对自然造成严重浪费，在长远意义上威胁着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另一方面，资本在全球自然资源掠夺中产生了一种不平等生态交换，譬如，爱尔兰的肥料出口给英国却只得到微薄回报便是一个典型例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一种全新的马克思生态唯物论和社会主义，建构一种以实质性平等和可持续生态为基础的社会。

约克大学莫罗·布凯里（Mauro Buccheri）教授主张重新激活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精神以超越资本主义的深渊。他巧妙地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比作西西弗斯推动的“巨石”，强调人类解放的第一步就是反抗这种必然性。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核心正是源自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论的自由意志。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经历了《博士论文》的直观人本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历史人本主义、《共产党宣言》的革命人本主义和《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科学剖析与批判，为我们冲破当代资本主义的深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此外，与该议题相关的论文还有约克大学乔治·科米奈尔教授的《关于资本的政治理论：商品拜物教》，列奥·潘尼奇（Leo Panitch）教授的《超越资本的挑战》和英国兰卡斯特大学鲍勃·雅索普教授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分析》。

（三）《资本论》的革命意蕴与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重新发掘和拓展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革命要素和未来构想、重构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最终旨归。这也是本次会议讨论最热烈的主题之一。过去，《资本论》通常被视为一部纯理论的经济学著作。但实际上，《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革命要素。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荣誉教授艾蒂安·巴里巴尔借助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深入探讨了马克思的“剥夺者被剥夺”一语背后的原初语境和多重革命策略。他指出，《资本论》是将科学历史理论与阶级斗争实践相融合的典范，在“剥夺者被剥夺”这一警句中隐含了四种不同的革命策略：第一种是“剥夺者被剥夺”的标准方案，即当资本主义积累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无产阶级就将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这种基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暴力革命策略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因为从德文原文来看，“剥夺者被剥夺（die Expropriateurs werden expropriert）”中的核心词皆来自法文词“expropriateur”和“expropriieren”（与之相近的法文

词还有“exploiteurs”，“usurpateurs”和“accapareurs”)。这些词汇正是法国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用语，代表着暴力的政治诉求。第二种是将资本主义金融机制革命化的策略。在《资本论》第3卷中，通过对信贷机制的研究，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在自身内部提供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真实工具，货币和劳动的社会化提供了克服私有制的新途径。第三种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无限社会战争”策略，这是马克思在“工作日”这一章中设想的一种阶级斗争方案，即通过无预定目标的社会变革和劳动立法来争取无产阶级的权益。第四种是基于“总体性从属”的虚无主义策略。马克思通过研究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控制了直接生产过程，而且统治了生命和日常生活的再生产过程。这种“总体性从属”使无产阶级斗争变得无力，预示了一种虚无主义的图景：资本的伪极权主义生命政治学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准。不过，马克思压抑了这种观念，转而积极地探寻另外几种政治革命策略。他最后强调，尽管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充满开放性和矛盾性，但其中的诸多问题模式为我们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趋势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样地，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凯文·安德森教授基于《资本论》第1卷特别是法文版，从种族、民族、殖民主义等多个角度剖析了马克思的五种革命观念：第一种是工人阶级暴动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否定。虽然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英国为原型，但他并没有提到工人的民族性和其他阶级，因此这一观念具有较高的抽象性。第二种是爱尔兰的农业革命所引发的英国工人革命，它动摇了英国工人和外来工人的族群化虚假意识。第三种是以美国内战期间种族化的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第四种是实行农村公社制度的非资本主义农业社会对资本主义侵蚀的抵抗。第五种是以巴黎公社为代表的废除现代集权制国家的革命。总之，马克思对革命问题的思考是立足于劳资关系的多线性和历史性视阈，而绝非一种还原论式的思考。

美国新学院理查德·沃尔夫教授认为，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和分配结构对传统阶级概念的超越为建构新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方案。具体来说，在马克思之前，存在两种阶级划分标准：财产和权力，并以财产或权力的重新分配作为社会革命的目标。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一种新的划分标准，即剩余的生产与分配。在马克思看来，在物质生产中同时发生着劳动过程和阶级过程，以此为基础的社会阶级结构就是关于剩余的生产与分配的社会组织。私有制社会在本质上是以剩余为基础的剥削性阶级结构，而资本主

义社会只是这种剥削结构的延续，因此，剩余的生产与分配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根源。作为资本主义之反题，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就是要在资本主义内部建构一种工人合作社，让所有工人平等参与生产，民主商议生产分配问题，只有基于生产过程中的民主平等才能建立真正的政治民主制。而这绝不是一种空想，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这种合作式经济形式已再次回归，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非资本主义企业建构的主导性原则。无独有偶，意大利比萨大学阿方索·M.拉科诺（Alfonso Maurizio Iacono）教授也关注到马克思对于合作及其矛盾的分析。他指出，马克思深受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社会动物”观念的影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合作只是以私利为基础的非团结性合作，社会与个人在本质上仍然是对立的。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通过对工人协作关系的考察和对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动物”和富兰克林的“制造工具的动物”的改造认识到，以社会组织 and 生产能力为基础的合作能力决定了个人的社会性，而个人能力正是通过这种合作关系发挥出来的。同时，马克思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合作组织中的个人能力解放与权力专制统治构成一对矛盾，这种强制性合作关系已成为剥削个人能力的系统性机制。另外，资本的全球化布展使得合作矛盾的另一维度凸显出来，即全球性合作生产在形式上提高了个人工作的弹性和流动性，但在实质上则加深了个人的工作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种更隐秘的奴役和统治。对此，我们需要重建马克思所倡导的那种非强制的共享性合作关系。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左翼阵营中一支非常活跃的流派，一直致力于通过重塑女性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来探寻新的革命路径，并以此来拓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与革命架构。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希玛妮·班内基（Himani Bannerji）教授对女性在马克思分析中的缺失做了批判性解读。她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将无产阶级塑造为以男性形象出现的社会革命主体和政治代理人，而女性却只被看作再生产主体。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将社会空间划分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进一步将女性的社会革命主体地位从生产方式总体中抹除。这既是对女性在生产方式总体中不在场之在场的强调，也是对女性的政治性在场的否定，从而将女性编码为一种肉体 and 情感的滋养。这种男性化的革命思路是狭隘的，阻碍了社会总体的革命化。不过，马克思的历史总体性方法为建构一种真正的革命政治学和社会总体结构提供了方法论支撑。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的西尔维娅·菲德里西（Silvia

Federici) 教授基于 19 世纪英美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重构过程, 重新思考了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她指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雇佣工业劳动看作资本积累的支柱, 并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雇佣工人通过自我再生产实现的, 而这恰恰忽视了非雇佣劳动对于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 马克思忽视了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由女性主导的家务劳动的重要性; 在国际劳动分工中, 种植园的奴隶劳动所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大大降低了欧洲工业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 在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问题上, 马克思只将生殖看作一种自然活动, 而忽视了女性的贡献和自主权;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 马克思曾将劳动(过程)的终结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要素, 这是因为马克思忽视了生殖劳动的重要作用, 而以情感为纽带的生殖劳动是无法被机械化的。因此, 若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反资本主义事业, 就要重新审视一切生产与再生产要素的潜在革命力量。英国赫特福德郡大学的乌苏拉·胡斯(Ursula Huws)教授指出, 数字劳动对资本积累方式和阶级结构的影响为重塑女性的社会主体地位提供了新契机。她指出, 虽然数字劳动还不是社会生产的支柱, 但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 数字劳动已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从而对资本主义积累(剥削)方式、劳动形式、阶级结构以及女性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 数字劳动扩展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实现方式, 比如网络公司的在线广告收益就是一种新的积累形式。其次, 数字劳动改变了传统劳动分类标准, 创造了新型劳动形式。数字劳动冲击了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 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仍然是把握新型劳动形式的根本原则。基于数字劳动的无偿再生产劳动主要有四种形式: 一是数字情感劳动, 即借助网络和社交平台进行的情感活动和社交活动, 这些非物质活动为商业广告提供了中介和对象; 二是“消费劳动”, 即消费者在网购后进行的评价和推荐等在线活动无偿地促进了商品销售; 三是创造性劳动, 包括无偿艺术劳动(如发布博客、照片等)和公益“免费劳动”(如无偿软件开发等); 四是无偿实习劳动或“志愿”劳动, 即雇主以教育或培训的名义无偿剥削潜在工人。今天女性在从事家务劳动时往往会涉及数字情感劳动、“消费劳动”、无偿艺术劳动等, 从而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就为我们重新定位女性在资本主义总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提供了现实基础。

此外, 丁声镇教授以“马克思论全球化”为题阐述了马克思对全球化或世界市场问题的研究过程, 强调马克思的“不平衡但相互联系的发展”理论、

国际价值理论以及“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危机—世界革命”总体策略对于重新思考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加里·蒂普尔（Gary Teeple）教授以“马克思论工资”为题阐述了马克思对工资意识形态的揭露过程，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供了一种超越工资的可能性前景，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器逐渐代替劳动，价值趋向于无，最终将实现劳资关系的终结。

（四）《资本论》的未完成性与当代书写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²）第二部分的全部出版，从文献和学理层面来考察马克思《资本论》的未完成性以发掘继续书写《资本论》的理论质点已成为不少学者热衷的研究路径。这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

作为MEGA²编辑参与者之一，莱特科教授从文献学角度详细分析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未完成之处及其原因。他指出，《资本论》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是未完成的，即便是第1卷也是如此。譬如，第1卷中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只是分析的起点，实际上关于它们的阐述贯穿了整个《资本论》三卷，且仍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就价值理论而言，价值在形成过程和实现过程中都是变化不居的，这就要求在随机动态的过程中研究价值问题，尽管马克思已想到动态价值理论的诸要素，但由于当时还不具备合适的分析工具和现实条件，因此他还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就货币理论而言，马克思对货币问题的研究从未间断和结束。在1867年之前，马克思就做过四次研究，经过《资本论》第1卷，在《资本论》第2、3卷中又做了更多修改。譬如，货币流通与一般物品流通的差别，受信贷关系支配的货币流通与货币市场、金融市场的差别等问题在马克思那里都未完整阐明，因此，《资本论》中不存在系统的现代资本主义货币理论。另外，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价值形成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等都存在诸多缺陷。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一是马克思晚年研究领域广泛，又投入到政治活动中，使他没有足够精力开展研究工作；二是马克思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问题是不断变化的，因而很多问题是无法完成的。最后他强调，指认《资本论》的未完成性并不是否定《资本论》的伟大贡献，而是要以严肃的学术态度重新发现《资本论》的理论空场，以期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中续写马克思的未竟之业。

美国纽约大学伯特·奥尔曼教授从辩证法角度概述了《资本论》的未完成性。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导言”都还浸润着辩证法的光辉，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弱化了辩证法的意蕴，而到了《资本论》

中似乎放弃了辩证法而完全采用实证方法。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完全抛弃辩证法，而是相对之前的手稿来说较少地运用了辩证法。而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把握马克思辩证法的四个重要方面：一是内在关系哲学；二是抽象的三种模式，即范围的抽象、角度的抽象和概括层次的抽象（包括五个层面：人类状况、阶级历史、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当下与当地）；三是辩证范畴；四是“变形”（metamorphosis）。从这四个方面来看，《资本论》的确含有辩证法的要素，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对于异化、商品拜物教、一般智力等重要问题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辩证法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彼得洛·巴索（Pietro Basso）教授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商品为起点的逻辑方法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如果今天重写《资本论》，应该以体现历史方法的“原始积累”为开端，这是因为：（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性批判有助于剖析资本全球化的当代过程、内在矛盾和指导当代微观实践方向；（2）马克思对于扩大再生产和社会总资本等问题的阐述有助于反思当今的资本集中和政府债务体系等现象。

最后，默斯托教授总结道：面对当代世界的深刻变化，我们重读《资本论》的工作还任重而道远。他强调，此次会议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因为它既是我们过去潜心研究的思想交汇，又是我们未来砥砺前行的崭新起点。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沿袭跨学科的批判和反思传统，从不同角度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极右翼势力抬头的当下，积极介入社会现实，参与进步的社会运动，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启示。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保罗·沃伦（Paul Warren）在《共和国》杂志 2017 年第 4 期发表《卡尔·马克思和威尔特·张伯伦，或者运气的平等主义、剥削和走向资本主义的纯粹路径》^①，该文着重说明运气平等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相容的，因为后者考虑到走向资本主义的“纯粹路径”的可能性。它探讨了纯粹路径的本质和结构。沃伦认为，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能够满足走向资本主义讨论的纯粹路径的

^① Paul Warren: “Karl Marx and Wilt Chamberlain, or: Luck Egalitarianism, Exploitation, and the Clean Path to Capitalism Argument”, in *Res Publica*, 2017 (4).

挑战，因此运气平等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是不相容的，前者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剥削是不公平的。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环境学院哲学系的格雷戈里·麦克尔森 (Gregory M. Mikkelsen) 在《人类生态学》杂志 2017 年第 1 期发表《环境价值、人类本质和经济民主》^①。该文提出，最近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公众与最富有的少数人相比，其行为更符合伦理，而且具有更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然而，后者控制并主导着经济。这说明将少数人的权力赋予多数人会产生一种更好的生态环境。该文阐释了“经济民主”的含义，它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它把权力从富有的股东转向普通公民和工人。该文对比了经济民主的基本理论与一些思想家的“可持续资本主义”的理论，以及关于经济民主的其他生态学论证，它们建基于经济稳定性和自我利益，而不是伦理行为本身。

《重思马克思主义》在 2017 年第 3 期发表了评论伊丽莎白·雷米 (Elizabeth Ramey) 《20 世纪阶级、性别和美国家庭农场》的系列文章。美国西蒙斯学院卡罗尔·碧维纳 (Carole Biewener) 的《关于 20 世纪阶级、性别和美国家庭农场的思考》^② 反思了《20 世纪阶级、性别和美国家庭农场》的一些主要观点。通过记录古代农民的自我剥削和对农民妻子、孩子的封建剥削，雷米反对简单地把“家庭农场”当作“工业化农业”进步的替代品。她对家庭农场动力的阶级分析有助于说明女性无薪的家务劳动的程度和意义，也有助于说明家庭关系的本质。雷米还提供了一个关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阶级的复杂政治经济动态分析。美国密歇根大学苏珊·贝吉隆 (Suzanne Bergeron) 的《混合阶级动力、性别和家庭经济：论 20 世纪的阶级、性别和美国家庭农场》^③，认为《20 世纪阶级、性别和美国家庭农场》是研究家庭经济和美国家庭农场的重要著作。它通过研究家庭农场的混合本质深化了对家庭的阶级分析路径。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的威廉·沃勒 (William Waller) 的《从原始的制度主义视角反思阶

① Gregory M. Mikkelsen: “Environmental Values, Human Nature, and Economic Democracy”, in *Human Ecology*, 2017 (1).

② Carole Biewener: “Reflections on Class, Gender,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Farm in the 20th Century”,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7 (3).

③ Suzanne Bergeron: “Hybrid Class Dynamics, Gender, and the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A Review of Class, Gender,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Farm in the 20th Century”,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7 (3).

级、性别和 20 世纪美国家庭农场》^①，从原始制度主义的视角探讨了雷米的著作，特别是在研究土地使用权、家庭结构、家庭农场的竞争特征、政府的农业计划效果、阶级分析问题等方面。

雷米在《重思马克思主义》同一期发表《阶级、性别、政治和当今的美国家庭农场》^②作为回应。她首先探讨了女性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包括最近美国女性农民在数量上的增长。其次，她质疑了替代性食品倡议的性别动力。最后，她讨论了中西部家庭农场消亡的政治影响。该文阐述了研究家庭农场的阶级和性别动力，以及其他食品和农业机制的重要性。

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的泰森·刘易斯 (Tyson E. Lewis) 在《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2 期发表《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遭遇：阿尔都塞、质询和研讨会》^③。该文重新解读了阿尔都塞基于其基本教育问题“质询”的著作。阿尔都塞在他的著作中有三处讨论了教育问题：以学校为主题的著名论文《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以大学和教育功能为主题的著名论文和一个有关工会的主题更加模糊的参考文献。它们都讨论了质询问题，但这三篇文章都无法把阿尔都塞自己作为教育逻辑的研讨班实践真正理论化，这个实践导致了师生合作阅读《资本论》。总之，制度性的国家机构质询了个体，工会提供了一个反质询，研讨班是一种无质询的形式，必须被理解成阿尔都塞后期作品的教育无意识。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贝弗莉·贝斯特 (Beverly Best) 在《历史唯物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3 期发表《透过镜子看政治经济：早餐前关于金融的六件不可能事件》^④。利普玛和李、布莱恩和拉弗蒂认为，当代“投机”资本主义或“循环”资本主义代表了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积累形态的深层断裂，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批判现在是多余的了。贝斯特认为尽管金融化的外表改变，社会统治的本质特征在金融化构建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积累过程中展现出来，而不是更早期

① William Waller: "Reflections on Class, Gender,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Farm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an Original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7 (3).

② Elizabeth Ramey: "Class,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Farm Today",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7 (3).

③ Tyson E. Lewis: "A Marxist Education of the Encounter: Althusser, Interpellation, and the Seminar",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7 (2).

④ Beverly Best: "Political Economy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Imagining Six Impossible Things about Finance before Breakfast",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7 (3).

的资本运动的延续。这样，阶级、剥削、价值形式等马克思传统范畴在金融化时代对社会统治模式仍然具有分析效力。

美国劳洛施大学的保罗·勒布朗 (Paul Le Blanc) 在《历史唯物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3 期发表《列宁研究：方法与组织》^①。当代不断增长的危机和斗争使列宁研究大火，这项研究有助于当代活动家发展革命策略、组织和斗争。在这一研究领域，安东尼奥·内格里 (Antonio Negri)、塔玛斯·克劳兹 (Tamás Krausz) 和阿兰·桑德罗 (Alan Shandro) 的研究值得注意，他们关注所谓“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内核。他们都把列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考茨基等著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区别。结果，凸显了列宁在早期共产国际中的作用，提出了与未来斗争（特别是组织问题）有关的革命边界。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马塞洛·霍夫曼 (Marcelo Hoffman) 在《历史唯物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2 期发表《阿兰·巴迪欧、毛派调查和政党形式》^②。法国关于毛主义的学术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复兴了。毫不奇怪，毛派的调查实践在近年来获得颇多关注。这些关注被包含而不是被遮蔽在更广阔的历史和注释事业中。该文试图通过关注对法国农民的毛主义的最长的、最详细的调查，突破法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联盟的巴迪欧基金会出版的《贫困农民》(1976) 中提到的限制。这本书生动地展示了与调查实践有关的困难和局限性。因此，它为这一实践提供了一个更有批判性的分析。这本书也以新的眼光将对巴迪欧的考察转向了“无政党的政治”。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马卡尔·梅尔克尼安 (Markar Melkonian) 在《历史唯物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2 期上发表《普通思维的悖论：对常识的回顾：索菲娅·罗森菲尔德的政治史》^③。该文指出，不管常识是什么，它除了在实践中不证自明之外还有其他含义。在《常识：一部政治史》中，罗森菲尔德描述了前现代的常识，把它的根源追溯到革命时代大西洋两岸几个城市的教授、出版商和小册子作者等小团体之间的辩论。从 18 世纪起，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拥

① Paul Le Blanc: “Lenin Studies: Method and Organisation”,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7 (3).

② Marcelo Hoffman: “Alain Badiou, the Maoist Investigation, and the Party-Form”,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7 (2).

③ Markar Melkonian: “Paradoxes of Plain Thinking: A Review of Common Sense: A Political History by Sophia Rosenfeld”,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7 (2).

护者和敌对者把常识渲染成非强制管制的“低调器具”，通过压制“人民”反对毋庸置疑的真理，来促进或抵制“人民主权”。20世纪初遭受打击之后，常识经历了复苏和重建，用来兜售各种商品和政策。罗森菲尔德描述了常识在现代民粹主义现象中所起的作用，她质疑了汉娜·阿伦特关于“真正的民主制造常识”的主张。同时，她确证和补充了安东尼奥·葛兰西关于“健全的见识”和政治的论述。

美国奥克兰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批判社会学》副主编格雷厄姆·卡萨诺 (Graham Cassano) 在《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3 期发表《一种新型公众的科学对象：理论和方法的思考》^①。理查德·麦金太尔 (Richard McIntyre)、凯伦·米勒 (Karen Miller) 和凯莉·海 (Kellie Hay) 阐释了《一种新型公众：新政电影的社区、团结和政治经济，1935—1948》的科学对象，该文即是对他们的回应。在电影文化作品研究方面，作者既没有提出一种观众反应的意义理论，也没有提出导演个人意愿和电影技巧的观念。电影本身就具有意图，但这些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电影制作者和想象中的观众制造的有意识和无意识意义的组合。在这个意义上，每一部电影都带着语境及其起源的印记。作者的方法不是一种破解观众反应的方法，更不用说是历史事件的因果解释，而是旨在从一定程度上衡量这些事件留在作品上的印象。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朱莉安娜·马克西姆 (Juliana Maxim) 在《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1 期发表《构建集体：社会主义现代主义的古典理论，罗马尼亚，1958 年前后》^②。该文考察了 1958 年前后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出现的特定原始主义修辞和社会主义架构话语中的现代化议程之间的矛盾。为了寻找各种媒体和结构中的古老原则，该文具体讲述了两个案例：布加勒斯特的露天农村村庄的建筑博物馆和 H. H. 斯塔尔的人种史学著作中的原始公社观念的复兴。这篇文章显示了如何在原始主义思考语境下理解社会主义新住房的现代主义建筑区。该文认为与快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相伴的是，原始中内在的、寻求集体的、相容的实践。

美国休斯敦大学的阿列克谢·格罗比夫 (Alexey Golubev) 在《重思马克

① Graham Cassano: “The Scientific Object of A New Kind Of Public: 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Method”,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7 (3).

② Juliana Maxim: “Building the Collective: Theories of the Archaic in Socialist Modernism, Romania circa 1958”,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7 (1).

思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1 期发表《“美妙的森林之歌”：建筑遗产和探寻俄罗斯北部的历史真实性》^①。该文探讨了“二战”后俄罗斯北部的建筑保护运动，提出地方建筑是理解俄罗斯的国家历史的关键。苏联建筑的保护主义者怀着浪漫的国家主义观念，他们把俄罗斯北部的地方建筑当作一种审美系统，完全实现了木材作为建筑材料的表达潜力。此外，苏联的保护主义者把这个系统与解决俄罗斯北部存在的社会冲突联系起来，这些冲突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沙皇的压迫。虽然苏联的建筑保护主义者广泛采用了莫伊塞·金兹伯格 (Moisei Ginzburg) 和阿列克谢·加恩 (Aleksei Gan) 等马克思主义建筑师的概念，但他们僵化了早期苏联的建筑理论的社会变革计划。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谢尔盖·乌夏金 (Serguei A. Oushakine) 在《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1 期发表《社会主义浪漫主义及其生活戏剧》^②。该文介绍了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 (Sotzromantizm) 观念，用来反思和批判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的现实社会主义。大型的历史规划依赖对空间的浪漫重构，生成各种身份、社会共同体、精神价值及其与过去的联系，它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性主义经典有根本区别。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提供了一个立场，以挑战描绘后期社会主义社会的教条，实用主义的犬儒和有利于政权的白痴同时存在于这个社会。这个概念使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使个体和集体参与社会主义的观念、制度、空间、对象和身份。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的埃琳娜·盖朴娃 (Elena Gapova) 在《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1 期发表《“白翼下的土地”：社会主义白俄罗斯的浪漫景观》^③。该文探讨了典型的社会主义苏联白俄罗斯变成浪漫的、神圣的“城堡之地”的想象转换。20 世纪弗拉基米尔·克拉克维奇 (Uladzimir Karatkevich) 等知识分子提出了浪漫景观，通过生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共和国平行的空间，改变了土地的含义，使其成为维持生命意义的理智和道德追求之地。这种浪漫的转变指示了苏联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显示出了新式精英（知识分子和文人），他们试

① Alexey Golubev: “‘A Wonderful Song of Wood’: Heritage Architecture and the Search for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in North Russia”,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7 (1).

② Serguei A. Oushakine: “Sotzromantizm and Its Theaters of Life”,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7 (1).

③ Elena Gapova: “‘The Land under the White Wings’: The Romantic Landscaping of Socialist Belarus”,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7 (1).

图挑战共产主义政党的人类生存规划。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见证了新的国家空间和景观观念的出现，它们使非社会主义的历史意识合法化：觉醒的个体，而不是劳动阶级，正成为历史的主体和承载历史使命的行动者。

四、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学术著作

（一）《劳特利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手册》（2017）

编者：大卫·布伦南（David M. Brennan），美国兰开斯特大学；大卫·克里丝詹森-古拉尔（David Kristjanson—Gural），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凯瑟琳·德慕（Catherine P. Mulder），美国约翰·杰伊学院；埃里克·奥尔森（Erik K. Olsen），美国罗格斯大学。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特点是严重不平等、无法为公众提供稳定或充分的就业机会。事实证明，主流经济学在解决这些系统性问题上没有什么帮助，这使得学者另寻出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是这种替代性选择。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理论长足进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出现在公共话语中。这本书囊括了多个国家的顶尖学者的37篇原创论文，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同领域各有专长。该书论域广泛，涵盖价值理论、劳动过程、积累、危机、社会主义等人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且还涉及与马克思经典相去较远的女性主义、生态学、国际移民和认识论等。广泛的论域反映了马克思经济社会理论的发展，同时包含了当代学界的历史和前沿。该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讨论。

（二）《作为社会制度的货币：资本主义制度发展》（2017）

作者：安·戴维斯（Ann E. Davis），美国玛丽斯特学院。在这本书中，戴维斯通过对货币史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资本主义全新的视角与框架，即把货币解释为一种社会制度。货币通常被看作有价值的对象，其价值来自于使用者的认可。它作为市场“无形的手”的主要工具把不同的机构联系起来。货币把家庭与公司、工人与产品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就使得“分工”变得十分自然，并且对于人们来说，货币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把货币理解为社会制度这一问题要追溯到中世纪时期，戴维斯在该书中描绘了货币的演变过程，并阐述了其对公司和国家模式的变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对于长途商人、银行家和管理生产活动的职业经理人来说，货币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也起

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白宫中的特朗普：悲剧与闹剧》（2017）

作者：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每月评论》杂志主编，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福斯特在该书中使用了其他学者从未用过的分析方法：他把特朗普和这一届美国政府置于整个历史背景中来研究。他指出，特朗普只是经济体系停滞不前的终点，美国的自由—民主光辉开始淡化。在民主的表象之下，福斯特看到了独裁统治，包括降低工资、反科学、否认气候变化、垂死的公共教育体系、扩大监狱和军队规模等一系列反常现象。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一个虚伪的民族主义者所推动的，这种民粹主义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福斯特没有下结论，而是认为他的分析吹响了反击的号角：抗议、民众需求、联盟都是每个人需要的。在缺乏反资本主义的激进政治斗争中，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福斯特也强调，即使现在，人们仍然有可能阻止对地球的亵渎，结束无休止的战争，团结全球受压迫的人，但是处于温水中的人们能否做到，让人深感忧虑。

（四）《资本主义的转型：马克思主义视角》（2017）

作者：赛义德·拉纳玛（Saeed Rahnama），加拿大约克大学。该书通过与世界各地的杰出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进行对话，探讨了社会主义左派改革主义和革命主义策略受挫的原因。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议程方面，受访者认为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由于其固有的矛盾，因此是不可持续的。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实现的。尽管观点各异，但所有受访者都通过参与各种社会团体呼吁彻底的社会变革，这些社会团体在推翻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五）《为陷入困境中的左派定位：构建当下的政治话语》（2017）

作者：戈登·哈克（Gordon Hak），加拿大温哥华岛大学。该书在当代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左派的个体、社会、国家、经济关系和历史变革观念。从叙述角度来看，该书涉及许多具有争议的左派理论，比如社会民主、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并且讨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不仅区别了左派与自由资本主义和其他进步运动（比如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的运动），而且它把当代的左派视为历史传统与未来愿景相互交织的产物。

（六）《帕尔格雷夫批判理论手册》（2017）

作者：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J. Thompson），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该书是第一本从哲学、政治、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角度探讨批判理论的著作。它不仅强调批判理论的历史和哲学根源，而且强调它的当代主题、发展趋势和未来应用。它阐述了塑造批判理论传统的特定研究领域，如批判社会心理学、美学、文化批判、交往行为和工具理性批判。它的目的在于从多元的跨学科角度阐释批判理论的范式，说明其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贡献。

五、左翼论坛：抵抗

2017年6月2—4日，一年一度的左翼论坛仍旧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召开，该学院的宗旨是“为正义而教育”。来自全球的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行动团体代表、左翼刊物编辑等在一周时间里，可选择参加大约400场专题讨论、工作坊、艺术活动等。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抵抗”。一股强有力的抵制力量正在美国崛起，街道上充满了自发抗议的人们反对特朗普政权，这预示着美国进入了国内动乱时代，这在过去几十年从未发生过。抗议者的直接目标是新总统和他所领导的反动政权，但它也有潜力超越特朗普，去解决催生他的体制问题。最重要的是，刚刚萌芽的抵抗正在思考权力、战略和战术问题。与会者发现抗议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和令人迷惑的冲击，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为构建正义和解放运动、推动根本性的变革敞开大门。

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在白宫的办公室里，高度组织化的种族主义和厌女主义占了上风；共和党人已经开始行动，准备完成他们最终解体公共部门和福利国家的梦想；一位威权型美国总统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找到志同道合的“暴徒”，以达成协议，将最后一批资源和利润从我们这个深陷危机的星球上抽走。可悲的是，特朗普在制度上最强大的对手是那些渴望回到与苏联冷战的辉煌时期的人，更不用提军火制造商、承包商和新闻机构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战争和冲突仍然是最赚钱的行当。其他的对手是民主党，即使他们没有完全忘记那段民粹主义历史，以确保提名是最不受欢迎的、最军国主义的财阀候选人，而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社会主义者，毫无疑问，后者将计就计。

不消说，这些制度化力量都不支持劳动、集体所有、种族自由或生态修

复。当竞争对手在为一个残破体系的最后财富而斗争的时候，美国左翼必须找到自己的优势，并在这种不稳定的新形势下培育自己的力量。在过去几年里，抗议运动正在兴起，美国长达几十年的右倾趋势被遏制。人口两极分化，双方比以往都激进。就左翼而言，直接的行动，特别是毅然决然的勇士们的行动获得了广泛支持。一位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者与白宫仅有一步之遥。美国的年轻人更喜欢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黑人生命运动组织建立了一个种族联盟，反对警察的暴行和国家许可的种族谋杀。因为这个政权推行厚颜无耻的权力和利润政策，数以百万曾经温顺的中间派和自由主义者正被其激进化，甚至在报道国内外的反工人政策和军国主义政策时，都没有提及“自由市场”或“民主”等意识形态表述。

旧的“合理的、负责的”剥削制度已经瓦解。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极有可能产生真正激进主义的时代。尽管如此，左翼力量仍未成熟，没有大规模的动员组织，也没有探索能够凝聚力量、取得胜利的策略。目前他们的任务是帮助组织、培养和塑造正在席卷全美的原生抵抗力量，并在它觉醒时做好规划。

人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在民主党内部工作的策略是什么，是不是组建一个新的政党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今天的民众，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在哪里？社会身份是否塑造了工人的日常生活，阻碍了阶级组织的发展，或者它们是否指向最激进的组织方式？当发生大规模的权力争斗时，左翼运动的优势是什么？左翼如何参与到强有力的国际劳工组织中来，这既是工人权力的关键，也是当今众多地区反移民权利的解药。最重要的是如何构建下述三种结构：形成一种左翼常识的激进文化干预、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最重要的是，通过大规模整合的罢工使生产和再生产停止运转的经济能力。这是2017年左翼论坛的主旨。左翼论坛的力量一直是它在许多方面对众多群体的普世包容，以及进行多方面的斗争。他们将通力合作、共同努力、求同存异，组建国际的、多种族的、非性别化的工人阶级力量。本次论坛是美国左翼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他们一起讨论、规划、制定战略、推进，把历史的、分析的、理论的、策略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是有史以来美国左翼最艰巨的任务。

为此，左翼论坛围绕着如何组织抵抗这个实质性问题展开。它要求每个分会场都提交自己的会议提纲，包含一系列步骤，最后落脚在组织人们策划、分享和展望的小组会议或者更为非正式的联谊会上。今年的论坛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因为它有数千人之众且是无宗派的，它将形成广泛的左翼联合战线。

现在左翼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只能联合起来捍卫那些来之不易的权利和自由，从工会到民权再到堕胎。左翼必须将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抗议活动，转变为切实有效的抵抗。他们需要从体制中打开缺口，也需要认真考虑在美国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同时，左翼也应该致力于更广泛的变革(把一个基于异化的、抽象的、剥削的系统转变为一个基于人类自由和可能性的系统)，它是左翼的根本目标。

大会发言者包括美国政治活动家奥斯卡·洛佩兹·里维拉 (Oscar Lopez Rivera)，他在 2015 年的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被誉为“美洲的曼德拉”，他是美国历史上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也是波多黎各和美国殖民关系史上被关押时间最久的政治犯；前黑豹党成员塞古·奥廷加 (Sekou Odinga)，他现在是社会活动家、演说家，在美国各地的大学发表过演讲，内容包括政治监禁、大规模监禁、黑人解放斗争等；美国艺术家和作家莫利·克莱伯艾坡 (Molly Crabapple)，她在 2013 年举办了个人展览——“贝壳游戏”(一系列关于 2011 年革命的大型绘画作品)，由此她被称为“艺术可以突破镀金画廊”的象征；巴勒斯坦裔美国民权活动家、种族平等主义者琳达·萨索尔 (Linda Sarsour)，她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500 位穆斯林之一；资深媒体人格伦·福特 (Glen Ford)，他在广播、印刷和网络新闻方面有超过四十五年的从业经验，是黑人左翼新闻、评论和分析周刊《黑人议程报告》(Black Agenda Report) 的执行编辑；著名战地记者杰里米·斯卡希尔 (Jeremy Scahill)，他是电影《肮脏战争》的制片人和编剧，并获得奥斯卡奖提名；此外，还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家辛西娅·阿鲁萨 (Cinzia Arruzza)，她是 3 月 8 日国际女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记者、作家罗·考夫曼、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的创始者之一麦当娜·桑德尔·霍克 (Madonna Thunder Hawk)；气候和食品正义活动家南希·罗默 (Nancy Romer)；草根组织纽约伯尼团队的创始者塔夏·范·奥肯 (Tascha Van Auken)。

论坛的主要议题如下：

1. 女性主义。社会活动家、社区组织者和基层领导人表示要继续反对毗邻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达科塔通道。根据特朗普的命令，美国陆军工程部将批准能源传输公司完成最后一段管道铺设。它还终止了奥巴马在任时实施的环境评估。这次会议将解答下述问题：抗议是否能够引发社会的彻底变革？女性似乎站在斗争的最前沿，那么她们是否正在崛起并成为社会斗争的领导者？在 2017 年 1 月的女性游行中，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3 月 8 日，来自 30 个国家的女性参加罢工；5 月的大罢工正是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

是否是未来的征兆呢？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抵抗吗？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抵抗运动，将目标类似的运动整合起来，并最终形成一个新社会？特朗普大选成功后的女性游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总统大选被特朗普的极端性别歧视和希拉里的狭隘的精英女性主义毁了，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它既可以联接所有受压迫的少数派，又把阶级政治的物质观念作为其基础呢？

2.“避难城市”。在特朗普竞选期间，北美流行起了“避难城市”，但是这种城市到底是什么还很模糊，它在捍卫民权和社会权、实施激进改革中的作用也不明确。那么，“避难城市”运动到底导致空洞的世界主义，还是引向更激进的正义？这是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3. 超越资本主义。当今经济体系面临的问题、挑战和对立比过去 70 年的任何时候都多。现在，数百万人都认为资本主义是引起各种社会运动的问题或危机的主因。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批评家和社会运动走向联合。如何将该联盟发展成一支改变现状的主要政治力量，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4. 深海私有化和地方抵抗。深海矿藏是海洋经济剥削的重要对象，南半球的海洋国家被当作试验场，然而，生态、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危险仍是一个未知数。面对这些风险，当地人正发起反抗，要求在未制定出合适的社会和生态标准以前，应当停止这种开采。

此外，2017 年 11 月 3—5 日，左翼论坛和“洛杉矶进步人士”组织在洛杉矶贸易科技公司联合举办了“左翼海岸论坛”，作为左翼论坛的分论坛。该论坛的主旨是为洛杉矶及周边的左翼人士提供交流和学习的平台，以便抵抗体制的压迫。随着残酷的种族主义、反移民、反女性、反劳工意识形态占据了国家政治话语，西海岸的活动人士和组织者恰好需要一个新的平台，他们迫切希望与这一反动潮流进行斗争。左翼海岸论坛以纽约左翼论坛为模版，聚焦正在兴起的民粹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占领运动、“立岩”运动（Standing Rock）、“黑命贵”等，形成一场持续运动来创建一个种族和经济公正的世界，美国人经常谈及这样的世界，却很少付诸行动。在这次论坛上，与会者会参加街头抗议、网上请愿活动和“纵向思考”（siloe thinking），以这些方式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战线，以恢复所有受到威胁的权利和自由。其主要议题如下：

一是讨论工人 / 业主合作社的价值，以及广泛建立这种合作社的左派计划。纽约的民主制度在 16 个月的时间里致力于把人们团结在一起。抵抗组织

坚信他们比资本主义做得更好，致力于建立一种基于工人/业主合作企业上的团结经济。纽约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活动丰富的充满活力的社区，由于货币和权力的大量集中，很难进行系统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有50多名工人/业主合作企业成立，受到多方支持和资助，支持者相信他们正在为纽约市新的政治经济添砖加瓦。这些左翼反资本主义议程都应该得到支持。与此相关的是“劳工运动和工人合作社”。在20世纪初，一些贸易联盟在美国建立了许多工人合作社。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两个运动分道扬镳了。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它们又一次开始合流了。与此相关的是“沃森维尔罐头工人罢工：历史、教训和当前的影响”。三十年前，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摧毁了国内冷冻食品行业之前，加州的沃森维尔是“世界冷冻食品之都”。1985年9月，这个镇子最大的工厂的老板试图破坏墨西哥工人的工会，一千多名工人被迫罢工。这些女性几乎没有罢工经验，她们的工会也处于瘫痪状态，但她们还是组织起来了，坚持了18个月，迫使工厂老板破产，并且在5天后从新厂长那里获得了一份合约。这个小组讨论了沃森维尔罢工的戏剧性胜利及其启示。

二是非暴力抵抗：在圣地赢得和平。民粹主义在世界上，尤其是在圣地和美国兴起，应该把各方力量联合起来。多年来笼罩着圣地的严酷的种族主义、种族清洗意识形态，现在已经掌控了美国的政治话语。这个小组的重点是鼓励社会活动人士聚在一起，组织更多的非暴力抵抗活动（包括街头示威），以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这个想法受到了近期圣地爆发的非暴力活动的鼓舞，特别是陈克萨清真寺和巴勒斯坦绝食抗议等。

三是气候变化的革命计划和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灾难降临到人类头上。让数以万计的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由气候变化和其他社会运动（如黑命贵、争取15美元、反抗伊斯兰恐惧症和性别压迫、性别暴力等）引发的游行和组织并不是革命性的群众运动。这个工作坊的目的是，将各种兴起的社会运动联合起来，以抵御危在旦夕的气候变化灾难。左派该如何提出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计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预防和适应气候灾害，以及帮助最容易受到气候灾难冲击的有色人种社群和工人做好准备。工作坊将讨论如何积极主动地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破坏新奥尔良、纽约、休斯顿和波多黎各等地的“气候灾害重建社区”。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出色地分析了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但是仍然缺乏向那些在气候变化中受到冲击最大且

最无辜的人们学习的革命性计划，他们将带领人们走向社会主义。这个革命计划必须首先在我们的社区、工作场所、学校、社会组织中进行，并询问他们认为需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它们。它必须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开采化石燃料的具体方案，并改善那些受害者的生活。具体例子包括：(1) 大量增加免费的公共交通，在制造业中创造成千上万个新岗位：电力 / 太阳能公共汽车、火车、运输工人、建筑。(2) 大力增加铁路、火车、车站，包括改善和应对酷热和洪水的一切基础设施。如果基础设施足够，火车是最重要的疏散方式。(3) 在美国修建数千英里的交通分离的高架自行车道，并重新普及自行车。(4) 美国每座建筑的能源审计和改造，将减少 30% 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能在每座城市和制造业中创造数千个新的就业机会。(5) 建造收集、利用太阳能的民主社区。(6) 禁止所有私营能源，使其公有。(7) 停止对工业化农业的任何补贴，并把资金转向小型农村农场和城市农场。(8) 设立环境基础设施评估，并改造所有气候灾害（比如热浪、洪水）的高危社区，评估的标准不仅基于地理位置，而且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儿童的比重等。(9) 增加安全的、新的、零能源的公共住房和绿色空间，以缓解和适应热浪和洪水，绿色空间则种植粮食和本地植物。(10) 重建和大规模扩建具备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卫生应急人员的社区，雇佣上万人在社区中工作。(11) 与古巴及其他国家合作，它们具有世界上最好的气候灾难预案。(12) 逐步在每个家庭、学校、公共建筑中配备气候灾难工具，增加 1% 的企业税，来负担这部分费用。尽管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但局势还是可以扭转的。尽管可再生能源在这一年中显著增加，但化石燃料的开采、燃烧和使用仍然是能源主力。左派的方式必须与所有大型绿色环保组织和资本主义的绿色清洗不同，后者使得大多数人相信人们可以在不改变现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在不终结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对抗气候变化。它们认为，只要是一辆电动汽车，就可以 81% 的时间在驾驶，可以建造数千米的公路。只要是“节能”的，就可以建造超大的房子，继续购买不必要的商品。但是改变资本主义“利润高于一切”，用一种全新的、源自底层的、信奉“生活好，而不是生活得更好”的新社会取代资本主义就是不行。左翼的绿色方案必须与此不同。

四是战略问题：为生活必需品而战是反法西斯斗争。只有在现状良好的情况下，抵抗才有意义。群众运动和革命者开始考虑战略问题了。左派世代都在“反击”。面对日益强大的法西斯运动和牢固的警察国家，如何才能捍

卫自己的阵地呢？这个小组鼓励对这些关键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讨论。

5. 左派计划。信仰团体必须在为正义、和平和守护地球的斗争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推动和支撑左派的信念是什么呢？左派该如何合作呢？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D. Wolff）为当今的美国左派提出了一个计划。现在美国深受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困扰，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破败不堪。数百万人对两党制的信任已经不复存在。稳定和平等是否能够实现都不确定，更别提适当的解决方案了。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历史时刻，一种新的左派解决方案，也就是真正的系统性变革是可行的。

6. 选举人团：它应该留下来还是应该走？该小组将探究选举人团的起源，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美国人为什么继续用它来选举总统。作家、独立制片人莉莎·伊莱恩·斯科特（Lisa Elaine Scott）展示她的纪录片《过时的民主：21世纪的公民课》中的数据和剪辑。这个演讲的目的是让观众参与度最大化。

7. 与叙利亚和伊朗的进步人士团结起来。该小组介绍了叙利亚和伊朗的进步人士（包括女权主义者、劳工活动家、人权活动家、政治犯、库尔德活动家），他们反对阿萨德政权和伊朗政权的威权主义，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小组讨论了美国左派支援其斗争的方式。

8. 由抵抗到竞选：进步人士如何建立进步同盟来赢得胜利。成千上万的激进分子在竞选州和地方官员，他们受到桑德斯或吉尔·斯坦（Jill Stein）总统竞选活动，以及里士满、加州市长盖尔·麦克劳林（Gayle McLaughlin）和西雅图市议员卡萨马·萨布希（Kshama Sawant）的鼓舞。里士满进步联盟（RPA）通过选举无公司背景的代表，成功地将政治决策权交到人民手中。RPA经常与其他地方团体和跨党派结盟，动员人民支持进步的政策和候选人。与此相关的是“选举制度：问题及其解决”。该小组讨论了有关美国选举制度的安全性及其解决办法。它对此问题的历史进行了阐述，提出了选举安全危机的解决办法。除此之外还有“成立人民民主工人党”，该小组认为，美国工人、被压迫的人们和民主力量必须成立代表其利益的政治组织和政党，来对抗统治阶级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动员和发展草根运动。发言者有克洛伊·奥斯默（Chloe Osmer），她是一位劳工和移民权利活动家，已经有15年之久。她曾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许多行业组织过工会活动，包括建筑业、服务业和制造业。她的工作包括关注工人健康和安、移民和劳工社区联盟。奥斯默是一名普通的工会成员，同时也是罢工行动委员会的主席。

她目前担任洛杉矶劳工联合会的行动主管，她还曾在全国劳联—产联（AFL—CIO）担任组织者，在清洁洗车运动、加州劳工联合会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动中心工作过。

9. 废除货币保释：此举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废除加州的保释金制度，重点关注保释产业的低效率和掠夺性。与会者可以了解到美国有色人种的犯罪史。他们会对保释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有更好的了解。最后，小组讨论了与会者投入到废除保释金制度的斗争中的途径。

10. 大规模监禁的真正代价：该小组在讨论大规模监禁时，引入了神学角度（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学和虔诚的神学紧密交织在一起），讨论不局限于利用宗教团体的社会正义资本。它深入探讨了经济问题，例如，2017年在“自由的”洛杉矶如何才能启动一个35亿美元的监狱扩建项目。在“自由的”加州，如何在没有假释情况下，仍然有可能终身监禁罪犯，甚至这些罪犯不是主谋，而是被诱骗犯罪。“罪犯再造”行业实际上需要多高累犯率才能盈利。

11. 校园反法西斯网络：以团结对抗法西斯。这个工作坊介绍了校园反法西斯网络的工作，它汇集了美国校园内的教职人员、学生、员工和社区成员，以阻止法西斯分子对高等教育的攻势。特朗普的当选给美国各地的法西斯和白人种族主义团体壮了胆，他们招募队伍，恐吓校园社区；利用“言论自由”为全国数百个大学的学生和教师的恐怖和恐吓活动做辩护，这些活动大多资金充足、发展迅速。工作坊的参与者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并说明大学里极右“言论自由”事件的重要背景，这是对许多神话、虚假叙述和操纵谎言的一种反驳，它们都是“右翼”试图压制异议，并使法西斯主义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变成常态时所惯用的。左派可以寄希望于大规模动员和广泛的联盟来对抗这些右翼力量。尽管左派在许多问题上抱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团结一致，都致力于阻止法西斯在大学里扎根。左派还可以推动在校园里提供政治空间，以供教学、阅读小组、讲习班和战略会议之用，讨论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以及如何与之斗争。此工作坊的目的是在美国各地建立分会，并在国家层面协调各种反法西斯力量。与此相关的是“自我组织与革命：革命者之间的对话”。自我组织是左派的共同话题，即使在不同的革命潮流中也是如此。除此之外，还有“电影放映：多数选票斗争”。在美国，偏见是由种族主义、厌女症、性别歧视和仇外心理造成的。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言论和行动，以及目前的

政策，助长了美国的不宽容氛围。影片主要介绍了移民、拉美裔、穆斯林、黑人、女性和跨性别者面临的新一轮斗争。这部影片由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国家多元化委员会、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和黑人生命事务委员会联合出品。

12. 在特朗普时代的为正义而战的**家庭联盟运动**：“为正义而战的**家庭联盟**”（Families United 4 Justice）是美国受到警察暴力侵害的家庭组建的前线群体。2014年10月初，警察暴行受害者的侄女辛西娅·豪威尔（Cynthia Howell）呼吁对在纽约警察暴力事件中失去亲人的人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团体。这些受害者的亲友需要相互支持，分享资源，创造一个更加正义的社会，并使侵害得到赔偿。2014年该组织举办了三次会议，受害者的家庭聚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奠定了FU4J的基础。在第二次会议之后，这些家庭介入民主化进程，并取名为“为正义而战的**家庭联盟**”。随后，社区艺术家与该组织合作，在当年10月22日的美国国庆游行中为他们的亲人创作肖像，以反抗警察的暴行。现在，已经有近50个家庭加入该组织，他们希望将来可以进行自我组织，而不是由政治领袖领导他们或代替他们发声。这个组织的活动包括：推动集体正义、收集和整理个人故事和案例、开展有效的社会媒体宣传活动，支持其他需要帮助的家庭、从现有的社区结构中寻找支持，并整合可持续的自我照料方案。参与者会融入一个更大的家庭和支持者网络，规划他们的个人或集体愿景，对反警察暴力运动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这个小组对那些直接受到警察暴力影响的人及其亲友、社区活动者和社会正义组织者开放。康涅狄格学院的宗教研究和美国研究教授大卫·基姆安·金（David Kyuman Kim）的演讲“一种由爱推动的政治：重拾进步主义的希望和核心”提出，在特朗普时代的混乱和恶意中，进步运动正迫切需要希望和灵感的源泉。与其陷入绝望，不如扪心自问：一种由激进的爱情驱动的政治，将如何改变人们对自己、人民、国家和世界的想象？对于把同情和慷慨而不是追逐权力作为政治核心价值观的进步人士来说，未来有何种可能呢？激进的爱将如何重新定义进步政治的核心呢？与此相关的是“特朗普时代的审查和言论自由”。基于历史背景和语境，该小组提出保护和扩大第一修正案的策略，抵制对自由言论的审查。

13. 直面对有色人群的攻击：在这个小组讨论和展示中，参与者了解到在反抗针对有色人群的攻击中，社区如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探讨了以种

族为基础的暴力，揭露了主流媒体的犯罪化，以及允许这种暴力代际相传的国家。他们还讨论了当前的运动，以及分析社会正义活动家和社会正义组织如何增强对国家暴力所施加的影响。这个小组的主持人是“爱而非流血联盟”、为正义而斗争家庭联盟、美国人权网络联合创始人、奥斯卡·格兰特的叔叔克普斯·约翰逊，他也被叫做博比叔叔。2009年，他的侄子被巴特的一名警察杀害，其后创立了两家社会正义组织，即奥斯卡资助基金会和“爱而非流血联盟”，站在了美国消除国家暴力阵线的最前沿。

14. 黑人斗争—阶级斗争：该小组讨论社会主义理论和斗争如何成为黑人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主持人是蒂芙妮·华莱士（Tiffany Wallace），她是社会主义残障人士权利和革命斗争、女性运动和“占领运动”的领导者，在英格尔伍德和洛杉矶与中产阶级进行斗争。发言者之一是奥罗费米·塔伊沃（Olufemi Taiwo），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和教授政治哲学和元伦理学。他是一个由非裔美国研究生发起的公共会议的组织者，该会议的目的是寻找从白人至上、异教体制、资本主义、移民殖民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结构性暴力中解放出来的方法。他在讨论中介绍了下院的基本收入。最近他在写一篇论文“为什么一切都要花钱”，来分析和评论马克思的《资本论》。

15. 全面抵抗：社会正义运动的跨国团结。跟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在应对人类生存危机和机构的系统性变革方面，国际合作都变得更为重要。现在，监视和威权主义、无休止的战争、环境破坏和恶性经济战略不断侵扰着这个世界。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人类不能仅依靠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行动，而是要采取全球行动来对抗它们。国际运动、合作和团结是为了支持那些在战争地区或独裁国家的人，他们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无法进行抵抗，国际合作可以跟他们分享资讯和策略，进行有效的抵制和撤资运动，支持由气候变化和战争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想方设法阻止军队和军火商进行无休止的战争，改变以精英为主导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许多西方非政府组织采用了家长制的模式或者更糟糕的做法，南北合作的名声已经被败坏了。因此，国际合作需要确保采用适当的、非等级的方式，尊重那些处于危机中心地带的人们，给他们提供建议和方向。

该小组的成员黛博拉·罗杰斯（Deborah S. Rogers）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席，她在四个大洲生活过，与多种文化建立了联系。她主导了一项非营利的技术信息项目长达14年，为社区、部落和公民社会团体提供公

共利益研究、基层政治组织和战略法律干预，后者面临着对美国北部平原的发展和环境的抉择。在她将关注点从环境政策转向社会和经济问题之后，罗杰斯在印度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一所部落学院任教，并在南达科塔州开展了一项健康差异研究项目，为三个拉科塔保护区提供服务。自 2011 年起，她在联合国全球环境变化（德国）国际人类维度计划工作了一年之后，通过呼吁平等的倡议，推动了地方和全球积极分子的合作，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全球社会活动网络，以克服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平等。罗杰斯指出，美国的左派活动家往往不愿意参与国际政治合作，要么缺乏知识，要么缺乏时间，要么是拒绝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家长式作风。同时，她指出在这个危险的时代，国际运动、合作和团结是绝对必要的，并举出了这方面最好的和最差的例子。

另一成员尤格·恩沃克吉（Ugo Nwokeji）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非洲历史与非裔美国人研究院副教授。他在历史、政治经济和能源政策等学科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目前正在担任国际劳工组织（ILO）委托的出版物《非洲劳工通史》的顾问和科学委员。他也是《比夫拉湾的奴隶贸易和文化》一书的作者，该书于 2011 年获得了由非洲研究协会颁发的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图书奖。他指出，当今西方左翼激进主义的自给自足倾向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边界已经缩小了，跨国主义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中扎了根。这些倾向与作为早期国际人道主义运动基础的普遍主义是对立的，左翼活动家在国际运动中的弱势助长了国家暴力和恐怖主义，他们屈从于人权活动者，后者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描述世界各地的冲突，并由此塑造新的国际联盟、扩大自己的网络。

另一成员郑智元（Jiwon Chung）是斯塔尔国王学院艺术、媒体和社会公正的访问助理教授，凯洛斯剧院合唱团的艺术总监；他是一位结合艺术、媒体、教育和政治活动的跨学科学者，致力于通过跨国行动和团结来改变结构性暴力和纠正历史暴行。他是受压迫者戏剧的实践者，是种族融合、受压迫者戏剧和批判性表演艺术的前驱。他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全面的团结和抵抗是什么样子的？受压迫的人如何协调和合作来达到生存、抵抗、实现正义和变革的目的呢？团结一致的策略、战略、联盟和协同效应是什么样子的？他从地缘政治斗争的角度探讨了这些问题。

16. 关于公共教育的批判性对话：激动人心的“我们选择”（We Choose）运动来到洛杉矶了。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本地社区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应该

控制他们所在社区的教育方式。这个运动颠覆了选择学校的幻觉，推动了学校的进步。这个小组的主席是凯伦·沃尔夫，她创建了 PSconnect，通过家长和公众参与把公立学校和洛杉矶的西部社区联结起来。在基层的教育政治方面，她作为一名民选代表，在当地的学校治理委员会担任威尼斯社区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在新领导层的带领下，这个不知名的委员会将其工作重点转向了为市政官员提供政策咨询。作为一名通信专业人士，沃尔夫是公立学校校长的发言人，而且为教育和政治博客撰稿，如进步、城市观察、洛杉矶进步、K12 新闻网、Badass 教师协会，以及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历史学家戴安·拉维奇的博客。

17. 在大学里设立反叛者活动奖金：大学的体制无论是在其内部还是外部，通过疏离和剥削边缘群体，都加强了普遍的系统压迫。意识到这些破坏性的趋势，反叛分子的活动奖学金重新利用、重新规划了大学的资源，用来团结受压迫的社区和他们的变革性斗争。这个小组的参与者，作为反叛活动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建立一个由不同的激进分子组成的集会，以便交流和合作。在这个小组中，他们讨论并着力解决大学中存在的问题，引入激进的活动奖学金，探讨大学机构的非殖民化尝试，并且报告他们的实验进度和结果。

18. 能源、资本主义和环境危机中的三个问题：当活动家们在深入分析、制定战略、动员支持进步的社会变革时，许多人被周围发生的危机所吞噬。这些危机包括气候变化、不断升级的全球冲突、疯狂的政治“闹剧”、社会正义的剧烈崩溃、持续的经济低迷、不断上涨的食品和住房成本等。该如何理解这些导致灾难的现象？更不用说如何解决它们了。在本届会议上，汇聚风暴行动网络的成员首先概述了他们的“全局”分析，分析了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交叉。以能源、资本主义和环境（包括气候变化）的危机为核心，这个分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系统框架，把所有的活动都展现出来了。然后，他们提出三个往往被活动人士忽视的关键的、挑衅性的问题：（1）资本主义对经济增长（包括为了攫取利润对化石燃料生产的大力投资）的迫切要求是什么？在应对威胁地球的不断加重的环境危机时，活动家起到何种作用？（2）这些紧迫的生态问题在哪些方面需要重新定位“为了更多的人争取更多的”劳动力战略？这对于那些认为所有社会变革运动的核心是如何组织工人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3）能源、资本主义和环境的危机是如何把“差异性”（性别、种族、阶级、国籍等）问题置于地球资源争夺的核心？这对那些被边缘化的“他者”来说有

何影响？参与者对每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19.“她即人民”：演讲者艾梅·艾莉森（Aimee Allison）提出，有色人种女性是进步运动的核心，她们是活动家、文化创造者、选民和下一代政治领袖。“她”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种人们还未曾见过的政治，“她”让人们重新构思民主，因为有色人种女性成了美国所有女性和有色人种中的大多数。

20. 艺术与帝国主义：艺术和帝国主义破坏了两个伟大的资本主义假设：艺术必然是好的，艺术创造经济。这个小组探究了当代艺术是否真的是“颠覆性的”，艺术机构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追溯艺术在维持全球价值链的超级剥削中所扮演的经济角色，它质疑了当代艺术家及其机构在伦理、学理和经验方面所持的观点。丹尼尔·斯波尔丁（Daniel Spaulding）在他的演讲“批判与反叛：洛杉矶艺术政治”中提出，“激进艺术”概念是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因为艺术与资本主义暴力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共通之处。像达达主义那样的 20 世纪先锋或情境主义国际的经验是否可以表明当前的斗争是如何对抗中产阶级化和流离失所的，特别是在布尔岗？阿奴拉·维克拉姆（Anuradha Vikram）探讨了艺术机构对社区和社会所负的责任。他还阐释了文化资本是如何转移从洛杉矶和其他地方的有色人种社区中流出真实资本的！博物馆不仅仅调控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把福利外包的复杂“影子国家”的一部分。倪瓚·谢克德（Nizan Shaked）展示了后期资本主义如何塑造公民社会来增加财富积累，勾勒出私人 / 公共非盈利伙伴关系如何通过“艺术洗钱”从离岸外包和其他剥削形式中获得巨大利润。

21. 技术与革命的融合：技术和革命的融合是在美国和墨西哥举行的一系列集会，与会者讨论了技术和革命的交叉点。这次是在美国举行的第 17 届会议，完全由听众主导，没有组织委员会。

22. 克服对异议的强烈压制：该小组以洛杉矶对激进言论的压制为线索，梳理了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的斗争策略，分享了对未来的构想。通过一部进步文献《橘园与监狱》，参与者回顾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社会活动，它们推动制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言论自由的法律，并且讨论了历史进程和对异议的日益成熟的压制，提出针对新情况和推进进步活动的策略。

23. 美国对以色列的制裁：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近一半的美国公众支持对以色列的制裁，他们呼吁更新 1986 年的全面反种族隔离法案，目的是结束以色列的种族隔离，而不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几个趋势有助于这项任务的完

成：首先，以色列在建立种族隔离过程中，被迫向美国要求更多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其次，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正在下降，它在该地区维持专制政权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减弱。再次，以色列日益与欧洲和美国的反移民和新法西斯主义运动结盟，这与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最后，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埃及违背美国的法律，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伤害平民。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实践研究基地、
现代化与文明发展基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